

錢穆的素質教育

人與事

重讀國學大師錢穆著《師友雜憶》，記其中學讀書事，越讀越感慨。上個世紀初，錢穆就讀於常州府中學堂，其同學中有一人就是後來的劉半農；有個比他兩級的師弟，就是後來的瞿秋白；有個不起眼的學校，走出這麼多耀眼的人，一定有其獨到之處。而錢穆記錄的幾則師生軼事，恰可體現彼時的學風。即，講規則，有錯必究；重個性，全面發展，不拘一格。

先說這有錯必究。有一次考圖畫課，題目為《知更鳥，一樹枝，三鳥同棲》。錢穆畫了一長條表示為樹枝，長條上畫了三個圓圈表示為三鳥，每圈上部各加兩個墨點，表示為每一鳥之雙目。墨點既圓且大。同學們看見這張考卷，下課後都說鳥的兩隻大眼睛像圖畫科楊老師，正好被楊老師聽到，極為震怒，因此給錢穆打了零分二厘，比零分還低。還有一次，舍監陸士辛老師來查房。按規矩，每夜自修課兩小時，課畢開放寢室，定時熄燈，自此不許作聲。當時錢穆正與一個同學在帳內對床互語，士辛老師說，想說話可到舍監室跟我談。錢穆遂披衣起來，尾隨下樓。起初士辛老師並沒發覺，走近舍監室才發現後面有人，問其原因。錢穆答，按您說的到這裡來跟你談話。老師大怒，斥其速去睡覺。年終操行課，錢穆僅得二十五分。該時代尊師重教，不管是有意無意，拿老師開玩笑總歸要受到懲戒，錢穆對此並無怨言。

再說不拘一格。現今教育有素質教育和應試教育之區別。都說前者好，但真正運作起來，往往後者更有效，其實還是錄取指揮棒的原因。如果中學和大學錄取新生時都不唯一張試卷定終身，甚至採取面試方式，讓學生展示所有才能，爭論自然迎刃而解。錢穆所在學校的老師，考試時各有特點，不僅是個人特徵，或許終究還是時代特徵。

錢穆講，文史大家呂思勉給他們講歷史地理兩門課程，年僅二十五歲，在老師中最年輕。他上地理課，必帶一上海商務印書館所印中國大地圖。先將各頁折開，講一省，擇取一圖，在小黑板上畫一十字形，然後繪出此省之邊界線，說明此一省之位置。再在界內繪出山脈及河流湖澤。說明山水自然地理後，再增加都市城鎮關卡及交通道路等。一次考試，出了四道題，每題二十五分。錢穆尤其喜歡有關吉林省長白山地勢軍情的第三題，一時興起，刷刷寫了很多，不料考試時間已過，整張試卷僅答一題。呂思勉在辦公室閱卷時，有幾個同學隔窗偷看，見他看到錢穆一卷時，在卷後加了許多批語，寫完一張，又寫了一張。這些考卷本不發給學生，只批分數，因此不需加批語。而呂思勉手握一枝鉛筆奮筆疾書，寫字太久鉛筆需再削，為省事，他用小刀將鉛筆劈成兩半，將中間鉛條抽出不斷地寫下去。最後不知其批語寫了多少，也不知其所批何語。而錢穆僅憑這一道題就得了七十五分。可見當時學生的答卷觸動了老師，而老師也因這種觸動而給學生打了高分。今日西方國家學校教課，不注重死記硬背，從小學生即考問世界觀與價值觀，動輒就要回答世界和平問題，以便形成人生底色和健康品格。其實這一舉措在我國早已如此，不知後來教育為何轉為專注瑣碎的細枝末節，捨本求末。也許是因為細枝末節易於判定結果？對於人生觀世界觀問題，為師者常常自己也是糊塗一團，自然無法對學生進行教育與引導。

錢穆還回憶，當時學校裡設有「遊藝班」，分為多組，學生們可自由選擇。錢穆家七房橋有世襲樂戶丁家班，專為族中喜慶宴會唱昆曲助興。錢穆自幼耳濡目染，頗有興趣，於是選修昆曲組。笛、笙、簫、嗩吶、三弦、二胡、鼓、板等各種樂器，生、旦、淨、丑等各種角色，均有涉獵。他還專習生角，唱《長生殿》劇中的郭子儀，舉手投足像模像樣。吹簫尤其成為錢穆生平一大樂事，他每感孤寂時，便以簫自遣，其聲嗚咽沉靜，如同身處他境，軀體悄然遊蕩在天地之間。

錢穆少年讀書至今已一百多年，想今日之功利，念彼時之性情，豈不讓人痛心。

王國華

諾獎注重人類健康

域外漫筆

社會發展至今天，人類越來越關注自身生命與健康。作為國際上最具權威的諾貝爾自然科學獎，近些年來也越來越注重有關人類健康的方面的科研成果，既對以前已取得的成果充分肯定與鼓勵，又對今後基礎科研有一定的導向作用。它不僅限於生理學或醫學獎，也涉及到物理獎與化學獎——特別是化學與健康的關係確較密切，許多藥物本身就是化學品。今年的諾貝爾醫學獎與化學獎的評選，就重在人類健康。二〇一二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英國科學家約翰·格登和日本科學家山中伸彌，

有國人去德國旅遊，就是因為大量留下食物而被罰款。德國不少餐廳是反對浪費的，點菜要得當，不然會被罰款。社會資源，就要付出代價。

慈城

為「光祿寺」，其烹飪水坊間早有定評。清代，光祿寺的烹飪水平仍不見提高。《清代名人軼事》記載，嘉慶年間有一文人顧元照，中了進士後被選到翰林院寫文章，做到侍讀學士。他雖然品級不高，社會地位也清貴，還可享受皇上賜食之恩榮。到光祿寺去吃飯。顧元照的官飯吃得認真，還將就餐心得寫成一首《黃鸝兒》詩。

不過那個年代一些「效益特別不錯」的機構，自然是有小灶吃的。史料記載，清乾隆年間，那些生財有道、「效益」極高的單位，機關食堂可比五星飯店。《水窗春曉》描述當時各地衙門衙役機構的食堂，從頭吃到尾要三晝夜。此外，河務局的廚子每人只做自己的拿手菜，廚房裡煤爐數十具，各人做各人的，目不旁及。據說僅豆腐一項，就有幾十種做法，著實奢靡！

時至明清官宦愈下。明清兩代，負責為官員聚餐提供膳食的機構稱「光祿寺」，其烹飪水坊間早有定評。清代，光祿寺的烹飪水平仍不見提高。《清代名人軼事》記載，嘉慶年間有一文人顧元照，中了進士後被選到翰林院寫文章，做到侍讀學士。他雖然品級不高，社會地位也清貴，還可享受皇上賜食之恩榮。到光祿寺去吃飯。顧元照的官飯吃得認真，還將就餐心得寫成一首《黃鸝兒》詩。

我的父親新以在他五十歲那年（一九五九年）病逝，留下十五歲的我，拖着大病遺留的癱瘓的雙腿和肌肉萎縮的兩手兩臂，繼續在這個世界裡。我很不幸。但我又是幸運的。因為，此後長長的歲月中，父親的許多朋友都給予我父輩的關懷、誠摯，一如既往。其中，辛笛叔就是很親近的一位。

在辛笛叔懷念父親的文章中，多次提到「通家之好」這兩個字。他總說，我們兩家是通家之好，就是指我們兩家形如一家，情誼深厚。的確如此。

回望辛笛叔與父親的少年時代，他們就讀的是天津的同一所南開中學。雖然辛笛叔比父親低幾班，但他與我的二叔同班，亦是好友。當年南開中學的國文老師張弓，是父親的文學啟迪者，父親曾在自傳中深情地提到他。然而，後來我從聖恩寫的她父親的傳記中看到，啟迪辛笛叔文學愛好的也是這位國文老師張弓。書中，還藉當年學生的文字，惟妙惟肖勾勒出張弓老師的神態。這樣的巧合令我欣喜。想當年我們的父輩同學少年，活躍在南開中學的校園裡，懷揣着對文學的美好憧憬，……我想，這也是為什麼他們之間的友誼能夠從此延續一生的道理。

再說，辛笛叔與文綺阿姨的婚姻，也是我二叔牽的紅線。當年辛笛叔在清華唸書，二叔進入南開大學，文綺阿姨是二叔南開大學的同學，於是熱心的二叔就為他的中學大學同窗，牽成了這條紅線。

三十年代初，父親在北平三座門辦《文學季刊》和《水星》月刊，辛笛叔也是那裡的常客，他的早年詩作曾在《水星》上發表。那天在辛笛叔家裡，文綺阿姨已經坐在輪椅上，但談到父親，談到北平的「三座門」，談到當年的往事，文綺阿姨臉上光彩煥發。她對我說：「我們那時可敬佩你爸爸了。」那是大學生的敬佩，那是他們對自己青年時代的懷戀，也是對朋友的真情流露。他們跟着我二叔稱我父親為「大哥」，非常親熱地稱呼了一生。



（資料圖片）

以表彰他們「發現成熟細胞可以被重新編程為多功能的幹細胞（即誘導多功能幹細胞）」所作出的突出貢獻。據評委會介紹，人類從受精卵開始發育，在受孕的第一天後，胚胎由未成熟細胞組成，每一個未成熟細胞都能發展形成成年肌體的所有細胞類型，這樣的細胞被稱為多功能幹細胞。隨着胚胎的發育，這些細胞進入多步形成神經細胞、肌細胞和肝幹細胞等在人體內承擔特殊機能的細胞。很長一段時間裡，人們曾認為未成熟細胞發展成特定成熟細胞是單向性的，不可能再回復到多功能幹細胞的階段。但這兩位科學家通過多年實驗研究，能將特定成熟細胞重新編程為誘導多功能幹細胞。這就開闢出了疾病研究新途徑，並為疾病治療找到了新突破口。

消費文明

西籍的同學家境差，到了下半個月就沒有錢吃飯了，大家會勻給他一些飯票，他也不覺得這是沒面子的事情，我們也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而現在呢，連我十歲的兒子，竟然也知道班裡誰家老老開的車貴，誰家收入高家裡有錢，誰穿的是名牌。我一次次教育孩子，要學習養成成績，要比較愛同學，同學也樂意與他們交往，家裡有錢的好成績，老師喜歡的時候，我不開車，而用電瓶車載他去學校，結果未到學校，就會要求我停車。這讓我非常生氣。因為我知道他怕同學們笑話他。我和顏悅色地「教育」他。但我發現，我的努力根本無法與這個社會氛圍、學校氛圍相抗衡。我無法將我「圈養」在家庭裡，一走出家門，他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環境，我怎麼改變得了這樣的環境。此類現象是繁雜而平面化的，但繁雜在現象背後的东西，卻是深刻而殘酷的。這個社會已經慢慢偏離了核心價值觀。有人說，當這個社會要倡揚一種東西，往往說明這種東西的缺失，現在倡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恰恰說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式微。德國不少餐廳是反對浪費的，點菜要得當，不然會被罰款。有國人去德國旅遊，就是因為大量留下食物而被罰款。在德國人看來，食物雖然不是消費者付錢買的，但資源卻是被社會的，你浪費社會資源，就要付出代價。

古代公務員的「工作餐」

劉亮

文化經緯

唐代工作餐規格高。盛唐時期的工作餐叫「堂饌」，後來又稱之為「廳餐」。唐代官至宰相的劉蕡，冬天上早朝途中，曾買些小吃，掩於袍袖之中。由於早朝後要留在朝中繼續辦公，有些人難以支持，國家便為高級官員實行工作餐制度。盛唐工作餐規格極高，僅限於供職宰相一級的地步。唐代宗時有位「以清儉自賢」的宰相常袞，曾為此上書請求「減膳」。

明代也有工作餐制度。據朱國禎的《視朝賜食》記載，「太祖每旦視朝奏事畢，賜百官食」。明代的工作餐規模相當可觀，但後來由於規模太大及享用的人員過多，朝廷的財力難以支持，又不得不廢止了文武百官的「廳餐」。明清兩代，負責為官員聚餐提供膳食的機構稱

「通家之好」

章潔思

這就是父輩這一代彌足珍貴的友情。對於我來說，令我難以忘懷的，就是辛笛叔對我寫作的關注。我一直在出版社忙於英文編輯工作，無暇接受任何來自其他方面的有關回憶父親的約稿。但是，九十年代，為某椿越說越離奇的文壇舊事，因為其中直接關係到我的父親，我不能不拿起筆來以正視聽。花費了許多精力，查找了許多資料，文章終於寫畢，並終於能在《香港文學》發表。我最先接到的鼓勵電話就是來自辛笛叔的。他了解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也是當事者的見證人。他在電話裡大聲對我說：「我們支持你！文章寫得太好了！」文綺阿姨也搶過話筒，對我支持的話，還說他們全家都支持我，都把我的文章讀了。

他們仗義直率的話音猶然在耳，至今令我感到溫暖。此後，只要有文章發表，辛笛叔都會第一時間來電鼓勵。甚至，有時我還不知文章發表，辛笛叔的電話已經來了。因為他有許多報刊雜誌，信息比我快。那些電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那些鈴聲，催促鼓勵我寫出一篇篇對於前輩故人的回憶，留作一點點親歷者的資料，補上文壇舊事的一點點空缺。

有時，為了某些事去辛笛叔那裡查詢，他總是娓娓講述，還會繞出更多的話題。譬如，我父親年輕時失戀是朋友圈裡熟知的事。父親早年的一些小說散文，都有失戀的影子。對方是父親在復旦大學的同班同學。但前幾年，不知怎麼搞的，忽然冒出個叫「王右家」的人，說父親與她青梅竹馬，後追求她而失戀。文中又談三角戀愛、四角戀愛的事，還隱晦地說父親是一名南開大學畢業的天津女中教師。一切的一切，都完全違背事實。但是報刊雜誌登出大片文章講故事，佔據很大版面，影響頗大。母親對於如此不負責任的文章感到困惑，與辛笛叔談及此事，辛笛叔也感嘆莫名其妙，他不僅以親見者身份斷然駁斥文中所述，還讓身旁的文綺阿姨對我講述她在南開大學求學期間見過的這位被炒得沸沸揚揚的王右家，以及當年王右家與羅隆基同出同進的親密情景。父親與王右家素不認識，故事編得實在太離奇了。

父親離世早矣，但有辛笛叔那麼真誠的朋友為他真話真言，深感寬慰。手邊，有許多本辛笛叔贈送的詩集。老實說，很久以來，我在心裡都沒有把詩人的頭銜和辛笛叔聯繫起來，也沒有早些讀他的詩。雖然，父親在世時，我早就看到書架上的那本《手掌集》，很老舊的一本，只因書名與封面上的畫如此相配給我留下印象。青少年時代的我，只知道沉醉在中外名著小說中，而不知身邊，就有一位那麼有名的九葉派大詩人。在我心裡，辛笛叔就是一位慈祥的長者，一位看着我長大關心我的父輩，一位與我一同嬉笑玩耍的大孩子。但是隨着我的成長，辛笛叔已經不再把我看作孩子，而是以成年人的尊重於我，這從他給我的贈書題字上愈發顯示。開頭是寫我的姓名，後來是我的大名，再後來則細細問清我丈夫的名字又一同寫上賢伉儷字樣，最後的幾本居然在我的名字後面寫了「女史」二字。我讀在慚愧。看着這些認真的題字以及圖章鈐印，我讀出辛笛叔的人格魅力。

十年前，二〇〇二年，辛笛叔年屆九十，上海圖書館為他舉辦「詩人辛笛叔創作生涯展覽」。那天我到會很早，在展廳的一幅幅照片前流連。回憶不由自主擁塞心頭。自七歲那年，在滬江大學校園第一次見到他，直到此刻。往事歷歷重現，親人的臉龐在眼前交替。那天，等到人路略散，我上前去與辛笛叔一起留影。我見辛笛叔喜氣洋洋的，一點也不顯老。他有詩心充盈心中，永遠年輕。

二〇一二年在上海作協大廳紀念辛笛叔百年誕辰，我並不覺得他已離去，我甚至想，應該買個大蛋糕，送來祝賀，就像以前一樣，我們圍繞着他，聽他的笑語不斷。但是，他畢竟留下我們離去，在八年前那個冬天的雨日——二〇〇四年一月八日。我常讀他的那首詩《一個人的墓誌銘》，為了聽他的聲音。此刻，我願意在這裡再讀一讀，聽聽他的聲音：「我什麼也不帶走，／我什麼也不希罕；／拿去，／哪怕是人間珠寶！／留下我全部的愛，／我只滿懷着希望／去睡！／請忘記我吧，／記憶在你已是沉重的負擔！／寂寞的時候，／且到園中走一走，看一看——在盛開的玫瑰那裡／也許正接連着一隻經冬的蝴蝶。」

我想告訴辛笛叔，記憶是美好的，美好的人和事，永遠不會忘記。

一九四七年七月辛笛（右一）、靳影（右二）、巴金看望沈從夫婦合影

莫言的學歷與閱歷

余仁杰

中國作家莫言，因其作品《將魔幻現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被授予二〇一二年諾貝爾文學獎。莫言的獲獎，表明國際文壇對中國當代文學及作家的深切關注，表明中國文學所具有的世界意義。近期媒體已連篇累牘對此進行相關報道及評論，這完全在情理之中。本文標題就是筆者想說的事。

諾貝爾文學獎是公認的國際最高文學獎。就在今年此獎未公布之前半個月，已有人在網絡上傳言莫言極有可能榮獲該獎，並引發了各種爭議。因為諾貝爾三個自然科學獎及經濟學獎的得主都有高學歷高職稱，頭上都有教授、博士或院士等等桂冠，那麼文學獎的得主是否也要有這類先決條件——其實是國人看到當今中國處處講學歷與文憑，所以對莫言能否獲獎就提出一疑問。如今仍有人關注莫言的學歷問題。莫言獲獎後，媒體對他的簡介是：

莫言，原名管謨業，山東高密人，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七日生。出身農民家庭，小學未畢業，在農村勞動多年，其間曾到棉花加工廠做過臨時工。一九七六年二月應徵入伍，在部隊歷任戰士、班長、教員、幹事、創作員等職。一九九七年十月轉業到報社工作。先後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和北京師範大學研究生班，獲文學碩士學位。

從上述簡介中可知：莫言在學階階段連小學也未畢業就輟學在家鄉農村幹活。想想也是，他一九五五年出生，十一年後即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即使不輟學也是未讀高小就「停課鬧革命」，後來復課也僅以學「語錄」為主，能學到多少文化知識？整個「文革」十年，他就不可能讀中學上大學。幸而他從小就痴迷書香，靠自學提高自己文化水平。一九七六年應徵入伍時，他已算得上有文化的新兵，因而讓他當教員、幹事；一九七九年在一家刊物上發表《春夜雨霏霏》的作品，開始在文壇嶄露頭角。於是部隊讓他當上創作員，從一九八〇年開始文學創作。一九八三年之後進入解放軍藝術學院學習，一面創作了「紅高粱」系列小說……一九九七年轉業後，邊工作邊讀北京師範大學研究生班，獲碩士學位。這便是莫言的學歷。

而筆者看重的卻是莫言的閱歷，首先是他自學的「閱歷」。據其兄長管謨欣的介紹，莫言從小就嗜書如命，常「搶書看」，晚上點着油燈看書到深夜；為了換取別人的書看，就給別人家推磨，有時整整推一天的磨才能換來一本書……莫言說：「對我影響最大的一部書不是文學作品，而是一部歷史作品，是在一九七〇年的時候讀到的向鄰居借來的《中國通史簡編》……」當然他也讀外國作品。看書自學，是莫言的真正「學歷」，為其創作奠定文化基礎。一個成名的作家總離不開其特定的生活經歷，也稱閱歷。莫言童年時正趕上三年饑荒，他幾乎瘦成一根豆芽。為了填肚子，野草、樹皮，他什麼都吃，甚至連煤塊都敢啃；十五歲以前都半光着屁股，參加一些不應該是孩子幹的活兒……他的老家及家鄉的生活環境，對其創作影響深刻；而常聽老人們所講的改朝換代歷史以及神仙鬼怪的故事，也是對其以後創作的一種啓蒙。

是我見



杭州有一位內地婦女資助了一位外省的貧困女孩。今年女孩考上了杭州的一所大學，這位阿姨帶著女兒去看望她，結果發現這位女孩不僅擁有蘋果手機，還有一台電腦。

這些東西自己的女兒也擁有，但一直沒有滿足她。而她的資助的這名女孩卻輕輕地說：「這台電腦在心裡放了幾個月，終於通過「旁敲側擊」了解清楚了。原來女孩的宿舍裡的同學大都有蘋果產品，她怕被別人看不起，於是用一個學期的生活費購置了這些電子產品。她說現在在外面「兼職」，吃飯不成問題。」

阿媽心裏的一結，是打開了，但又擔心開始的女孩在外面兼的是什麼職業。一個人的善良，往往是在這個紙醉金迷的城市裡到底有沒有打聽清楚，女孩在這個紙醉金迷的城市裡到底兼了一份什麼職業？

面子上問題，以前可以堂堂正正揮霍之，但現在如果把它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抨擊，似乎有些「不合時宜」了。因為大家都沉醉於形形色色的「面子工程」裡，你去「說三道四」，豈不是自討沒趣。

有位親戚的女兒考了一「三本」，本來是農家，收入不高，但夫妻倆給女兒買了蘋果三件套，花了將近二萬元，每月還給兩千元的生活費。夫妻倆在建築工地打工，他們辛辛苦苦賺錢，就認定了一個理：不能讓自己的女兒在同學面前抬不起頭。世風如此真實，讓人無話可說。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到江蘇讀中專，父親一頭挑着箱子，一頭挑着被子，送我上學。在報到現場，就像一個民工市場，父母們或在挑着或揹着什物而來，滿地都是鋪蓋，有的還把家裡鐵盆、碗筷都拿來了。那時候有位廣東籍的同學家境差，到了下半個月就沒有錢吃飯了，大家會勻給他一些飯票，他也不覺得這是沒面子的事情，我們也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